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十六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晋国青铜器艺术

李夏廷
／ 著

晋国青铜器艺术从春秋中期开始，进入复兴阶段，各种写实动物以其极为生动传神的造型崭露头角，人物形象也纷纷闪亮登场，使的晋国青铜艺术表现出清新秀丽，自由奔放的时代精神。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6辑)

晋国青铜器艺术

李夏廷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875 字数:300千字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49-5
G·20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	-----

一、晋国青铜文化概述	(5)
------------------	-----

(一)叔虞封唐——晋国青铜文化的	
------------------	--

发端	(5)
----------	-----

(二)晋式青铜器——晋国青铜文化	
------------------	--

的繁荣	(11)
-----------	------

二、晋国青铜器装饰艺术	(13)
-------------------	------

(一)晋国青铜器装饰艺术简述	
----------------	--

.....	(13)
-------	------

(二)神话动物造型	(16)
-----------------	------

(三)写实动物造型	(24)
-----------------	------

(四)几何形造型	(27)
----------------	------

(五)图像人物类造型	(28)
------------------	------

三、晋国青铜器典型器物举例	(35)
---------------------	------

(一)凤鸟尊	(35)
--------------	------

(二)猪尊	(35)
-------------	------

(三)	兔尊	(35)
(四)	别人守圉六轮挽车	(36)
(五)	子仲姜盘	(36)
(六)	鸷鸟尊	(37)
(七)	子之弄鸟尊	(38)
(八)	牛尊	(40)
(九)	铜牺牲	(40)
(十)	鸟兽龙纹壶	(40)
(十一)	龙凤纹壶(附赵孟庠壶)	(41)
(十二)	铜牺立人擎盘	(42)
(十三)	错金盖豆	(43)
(十四)	龟鱼纹方盘	(43)
(十五)	智君子鉴	(44)
(十六)	车马猎纹鉴	(45)
(十七)	凤钮铸	(46)
	结束语	(47)

引 子

铜是人类最早认识和掌握的金属。在中国商周时期甚至更早的新石器时代,产于南海的海贝,曾因珍奇难得而一度作为财物交换的介质。但随着铜的广泛使用,它便被取而代之。如商周时期的铜曾被仿制成海贝状,或铸成块状、饼状以作原始货币,春秋以后,铜铸货币(俗称“铜钱”)一经产生,便一直沿用到公元20世纪。

商周时,铜还广泛充作贡品、赏赐品或战利品。尤其是周代,每当谁得到铜,首先把它铸成“宝尊彝”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青铜礼器),还郑重其事地将得到铜的缘由铭刻在铜器上,并庄严地祈求“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据铜器铭文记载:至少在东周初年,地处黄河北岸的晋国,就曾派上千辆大车到数千里之外富含铜矿的江淮流域“取厥吉金”,也就是换取当地的铜,当时铜也称为“金”或“吉金”,可见其珍贵,两千七八百年前的当时,路途艰辛险阻可想而知!浩浩荡荡的车队不仅要携带辎重,还要有足够的武装护卫,他们同时还必须胜任车辆维护……由此更足见铜的诱惑力。当时晋国积极向东南经略,一直把遥远的宋、吴等江淮流域国家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其中或许有铜资源这一层缘由,因为无论古今,铜都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

在中国,铜对于当时的统治阶级还具有更非凡的意义。

他们把铜铸成各种奇奇怪怪的造型(其实无非是各式各样的锅、碗、瓢、勺或盆盆罐罐),并在上面铸出神秘兮兮的花纹,而后将其藏诸庙堂或宫殿,赋予其国家社稷的象征,“禹铸九鼎”和“问鼎中原”的典故即由此出。秦亡六国后,同样把毁灭或掠取他国宗庙彝器作为主要任务。当然,铜器确有重要的实用功能:它既可用为祭祀天地祖先,更可用于贵族们“钟鸣鼎食”的生活。由于当时人们视死如生,因此即便死后,也尽量将这些家什作为阴间的必需品带走,所以青铜时代厚葬成风,就连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国君“曾侯乙”,死后也竟然用重达十吨的各种铜器来陪葬,虽然忒奢侈了些,但客观上却为后世留下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总之,铜在当时就是财富,就是国家社稷和经济实力,同时它还铸就了文化和艺术,试观中国古代青铜制造技术和青铜装饰艺术所达到的成就,即便今天看来,在许多方面仍属空前绝后。再通观世界各古代文明,哪个不经历漫长的青铜时代?

中国青铜时代经夏、商、周三代共历1500余年,有着700年历史的晋国青铜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东周一代,晋文化范围逐渐覆盖了整个黄河中游,以致取代周文化而成为中原文化的代表。它与楚、齐、秦、燕、吴越等地的青铜文化交相辉映,共同将中国青铜文化推向又一个时代高峰。曾几何时,晋国(含早期三晋)铜器以鲜明的艺术特色和精湛的工艺成为当时中国青铜艺术新时代风格的典范,人们习称这一时期的晋国及早期三晋铜器为“晋式”或“晋系”铜器,它与长江流域楚系铜器是当时覆盖范围最

广，文化成就最高的两大青铜文化体系，同时也是汇成秦汉一统的中华文化洪流的南北两大主流。

晋国铜器最早的出土记录大概是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时年河东汾阴睢上（今万荣县庙前村）出铜鼎，武帝以为祥瑞，遂改年号为“元鼎”，并在此建后土祠以祭后土。唐朝开元年间，后土祠又发现铜鼎，唐玄宗遂改当地县名“汾阴”为“宝鼎”。此后，当地仍不时有铜器出土，著名的如清代出土的一套“郛钟”。二十世纪中叶，因黄河冲刷河岸，后土祠常有铜器被卷入黄河，为此，考古工作者作了抢救性发掘，并弄清该处原为周代晋国吕氏的一处墓地。

近现代晋国铜器出土遽增，其中相当一批为偶然出土或盗墓所为。如建国前出土的浑源彝器、智君子鉴、赵孟庠壶、子之弄鸟尊、兽面蟠螭纹钟、凤钮钫等，它们大多已流落海外，仅少数被国内博物馆收藏，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龟鱼纹方盘，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栾书缶，和现藏上海博物馆的部分浑源彝器等。属于考古发掘出土的主要有20世纪上半叶由前中央研究院在河南汲县和辉县发掘，现藏台湾的铜器群，以及建国后出自河南陕县后川、河北邯郸百家村、山西万荣庙前、长治分水岭、侯马上马、太原金胜、闻喜上郭、曲沃曲村、北赵等地的铜器群。粗略估计，各地先后发掘的晋（含早期三晋）墓逾三千座，出土各类铜器数以千计。

可悲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盗墓之风复炽，举世闻名的盗墓事件尤以晋地为甚。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安然沉睡地下近三千年的曲村——北赵19座晋侯及夫人墓，竟于1989——1998年间被盗墓集团在考古工地内连连盗挖

了8座!另据媒体报道:铸有长篇铭文的晋国“子犯编钟”一组16件(子犯,即跟随晋文公重耳流亡19年的咎犯,他也是晋文公的舅父),于1995年被盗运至台湾,其出土地尽人皆知为山西闻喜。还有:中国保利集团于近年耗巨资从境外抢救回100多件盗运出去的青铜珍品,其中重要的晋器有“戎生编钟”一组8件(上有长篇铭文,记述晋国车队去江淮流域换取铜的事迹)、“蟠螭纹编钟”一组四件、“虎耳蟠龙纹壶”一对、“错纹蟠螭纹铉”一对、“镶嵌水陆攻战纹壶”一对,以及“蟠螭纹鼓座”、“错铜鸟兽纹壶”等稀世珍宝,而这些都是世代文物考古工作者梦寐以求但却求之不得的国宝。

此外,由于锈蚀和墓葬崩塌挤压等原因,在北方黄土地区古墓内,铜器完好率往往不足二三成,即盗墓者每获2到3件铜器,便同时会有7到8件被毁弃,如盗挖晋侯墓地的盗贼,在作案过程中,将成堆本可修复复原器型的铜器碎片做为垃圾抛入深井和荒野。另外现代盗墓常用烈性炸药爆破古墓,所以文物毁损率更高。粗略估计,近20多年来,原晋地古墓中被盗和被毁的铜器当以千计,而同时遭到毁灭的,更有无数包含多种科学和文化价值的文物和信息。这种对全人类文化遗产的破坏和毁灭,无疑是不可宽恕的。因此,在打击文物犯罪,保护祖国文化遗产方面,有关部门和文物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晋文化在我国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页,中华民族文化有许多是源于晋,兴于晋的。试观先秦典籍《左传》《国语》《战国策》,记述最多最详的当属晋国及三晋故事。晋及

晋的前身——唐，以及由晋分化而成的三晋魏、赵、韩，亦因其史绩显著而屡屡成为后世封建王朝或帝国的名号，由唐衍生出来的“唐人”、“唐山”，如今更成为中国人和中国的代名词，因此作为晋国文化艺术重要载体的晋国铜器，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同时作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还具有丰富的科研价值和珍贵的文物价值。另外，青铜器本身又是艺术品，它凝聚着绘画和雕刻的综合艺术劳动，因此对美术史研究和当代艺术创作可提供丰富的素材和营养，基于此，这里仅侧重对晋国铜器艺术做一简要介绍，以便读者能通过对晋国铜器这一个“点”的了解，进而为全面认识整个中国青铜文化有一定的帮助。

一、晋国青铜文化概述

（一）叔虞封唐——晋国青铜文化的发端

晋国是两周时期重要的诸侯国之一，立国之初只有今晋南曲沃，翼城等县部分地区，是一个“位在侯爵”（周制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鄙陋之国”。经过不断兼并拓疆，终成“春秋五霸”之首。三家分晋前，晋地已据有今山西大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及陕西、山东各一角的大片领土，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国家。这种占据中原经济文化腹心地区的地理条件，和它本身固有的多元文化因素，使晋国青铜文化发展成既有自身特色，又具有深厚传统色彩的区域类型青铜文化，并由最初只是周文化的一个嫡系分支而逐渐成

为整个中原文化的主干。为了弄清晋国青铜文化的来龙去脉，我们还应从周初分封谈起。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在军师姜子牙的辅佐下，倾周族全部精壮兵力约五万人，并纠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个位于今陕、甘、川、鄂、晋一带的西方和南方小国，以“伐不仁”为名义，一举灭掉立国六百年的商王朝，建立了姬姓周朝八百年基业。为了巩固周王朝统治，周初实行了所谓“授民授疆土”的大分封。用现在的眼光看，这其实是一次大规模的部族殖民，当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次空前大融合，华夏文化的一次空前大普及。史载周初先后建立七十一国，其中兄弟十六，同姓四十，余为甥舅和异姓同盟等，其中周成王的同母幼弟叔虞被封为晋国的开国君主。因晋国始封地在古唐国故地，因而最初称“唐侯”或“唐叔虞”，“晋”是叔虞之子燮父才改的国号。

关于唐叔虞，史书有不少记载。《左传·昭公元年》：“当武王邑姜方震（娠）大叔，梦帝谓己：‘余命尔子曰虞，特与之唐……’及生，有文（纹）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史记·晋世家》：“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这就是著名的“桐叶封弟”的故事。至于“有文在手曰‘虞’”，有学

者认为：若按《石经》古文“虞”作“𡗗”，兴许还真有这种掌纹（𡗗字见于《六书故》《同文备考》。即古文虞字）。

据史书记载：周成王时全国共有人口“（一）千三百七十万四千九百二十三”（《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这大概仅指黄河流域周朝实控区的人口数，但无论如何，它都间接反映出当时地广人稀的状况。以此推算，最初叔虞统领的殖民者队伍似应不过万数而已。他们举着周王赐予的仪仗旗帜，带着周王颁布的册命文告《唐诰》，以及各种生存和作战物资，扶老携幼，风尘仆仆，一路车行步随从陕西一带辗转来到汾河下游古唐国故地，从此开创了晋国600多年江山。

与叔虞前后到今晋南地区封邦建国的还有若干小诸侯国，如杨、霍、贾、魏、韩、虞、荀、原、耿等，他们大多也是姬姓子弟，其封地地名后来演化成现今中国的一些姓氏。而与这些周人殖民地杂错其间的还有许多土著居民及游牧民族。周人称自己和原有的一些中原古国为“诸夏”或“华夏”，而称其它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为“诸戎”或“戎狄”。当时晋国周边有各种名号的戎狄，如条戎、山戎、犬戎、奔戎、茅戎、姜戎、林胡楼烦之戎、太原之戎、白狄、长狄、赤狄、潞氏、甲氏、隗氏，东山皋落氏、留吁氏、豷狁等等，正所谓“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左传》），从这些称谓上也反映出晋人及整个华夏集团对土著人特别是游牧人的某种蔑视。随着晋国扎稳脚跟并日益强大，便将四邻“诸戎”连同“诸夏”一起吃掉。因此说，晋文化的发端始于叔虞封唐，晋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共同体，其主要构成有：

第一，周文化。这是晋文化的主干，也可称作晋文化的根。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晋人在文化上始终追随着宗周模式，其文化最初不过是周文化的一个分支。而就青铜文化而言，周人实际上又多承商制，特别是周灭商时，将商的物质文化财富尽力掠取，如《逸周书·世俘解》说：“凡武王俘商，得旧玉亿有百万，”不仅铜玉宝器，甚至连商朝的“百工”（从事各种手工艺劳动者）也被作为战获品继续利用（晋国也必定会分得一些商朝“百工”），所以西周初年的晋国青铜文化与晚商文化有诸多接近。曲沃曲村西周早期的晋人墓中，还出有缴获的商朝铜器，北赵晋侯墓地中亦出有许多疑为商人制作的玉器。此外，晋侯墓地还出有本属陕甘一带西北地区的青铜双耳罐，铜三足瓮等器物，由于它们都出自晋侯夫人墓，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西北戎狄女子嫁到晋国的证据，从中亦可见晋国先民最初来源之一斑。文献记述晋国受封时，所封之物还有“密须之鼓……阙巩之甲”，密须、阙巩均为古国名，其中密须国地在今甘肃灵台县一带，早为周文王所灭，因此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讲，周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多元文化共同体。

其实，周人对山西地区的开拓由来已久，至少在商代晚期，周太王的儿子太伯、仲雍就在山西南部的平陆一带建立了虞国，其后周文王之父季历对山西地区的鬼方、燕京之戎、余无之戎进行过多次征战。稍后，周文王还灭掉山西东南部的黎国，因而有《尚书·西伯戡黎》。另《古本竹书纪年》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擒其三大夫”。

鬼方，“是殷商的一个方国，其文化程度已与中原差不多，只略有北方部族的风格。鬼方的根据地原来在今河套以北地区。当殷周之际，由于商朝国力衰退，鬼方就乘机进入今山西北部地区”（杨宽：《西周史》）。

燕京之戎，是一个古老部族，燕京，并非今天所指的北京，而是《淮南子·墜形训》所说的“汾（水）出燕京之山”的燕京山，也就是今天汾河发源地管涔山的异名，地在今山西中北部。

余无之戎，《通典》“余无”作“徐无”，《汉书·地理志》有“上党郡余吾”，今山西东南部屯留县尚有余无镇。

黎，地在今晋东南黎城县一带，“黎城”以及县内的“黎侯镇”，当为数千年地名之沿袭。

始呼之戎和翳徒之戎，学者多认为在山西中北部的滹沱河流域。上述可见，周人对山西地区的染指，或者说周文化的进入，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达到相当深的程度。更有学者认为：周人本来就源出山西，先周文化与今太原地区新石器时期“光社”文化存在渊源关系，文献上也能找出诸多证据（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邹衡：《论先周文化》），总之，周人与山西地区有着久远而密切的关系当勿庸置疑。

第二，土著文化。包括晋地原有的古国文化和游牧人的戎狄文化。上古时期，山西是一个多民族共同活动的大舞台。华夏祖先尧、舜、禹据传都曾居于此，史载“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三地均在今晋南一带。襄汾县陶寺发现的距今四千年前属于夏纪年范围的大型城址、遗址和墓地，也证明晋南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中心地区之一，因此

文献又称晋国始封地叫“夏墟”。另外地处汾河下游的临汾盆地，还曾是上古唐尧氏（或叫陶唐氏，即后来的古唐国）之地。最近，在临汾、浮山等地首次出土了相当于晚商时期的铜器群，或许与古唐国有关，同时证明商代这里存在有十分发达的青铜文化。

除此之外，夏商时期北方重要的方国，如土方、吕方、鬼方、黎国以及匈奴祖先荤粥、猃狁等部族也居住或活动于山西一带，山西地区广泛发现的属于商时期的“北方草原青铜器”即反应了这一现实。经济地理表明：横跨欧亚大陆北纬40度线附近及其以北一线为广阔草原，其气候、水土只适于游牧经济。古来这一地区生活着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匈奴人、鲜卑人等，他们虽然种族不同，却因共同的游牧生活方式，以及草原上文化传播快捷等原因，其文化表现出诸多共性。其中分布于中国陕北、晋北、内蒙河套等地及外蒙部分地区的古代青铜文化，在中国被称为“北方草原青铜文化”或“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上古的鬼方、荤粥、猃狁等方国或部族即与此有关。周初分封时，叔虞除分得各类物资以外，还分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即臣服或从属周王朝的土著人。所谓“怀姓九宗”，史家一般认为即鬼方之隗姓九族之人，“职官五正”则是世袭五种官职的地方贵族。为使叔虞在异乡能生存发展，周王教导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也就是用夏人的政令和戎狄的制度去治理晋国。随后，晋地原有的各种土著文化便与周文化逐渐融成一体，形成一种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新文化类型——晋文化。总之，晋国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现实，一开始就决定了

晋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在上述多种文化的滋养下，最终孕育出灿烂的晋国青铜文化。

（二）晋式青铜器——晋国青铜文化的繁荣

西周一代，除少数边远地区外，各地青铜器在器型和纹饰上尚无多大差异。进入东周后，天子衰微，群雄蜂起，列国割据，各地青铜文化遂走向各自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到春秋中晚期，便形成若干风格各异的地域类型青铜文化，主要有晋、楚、齐燕、吴越、秦等式别。就历年出土的东周铜器来看，晋式铜器（包括三晋韩，赵，魏铜器）数量最大，不下全部东周铜器的半数，若将礼、乐、兵、杂、车马器等全部统计在内，其总数当以万计。出土地则主要涉及晋、豫、冀、陕及内蒙地区。传世的东周铜器同样以晋式铜器数量为最，在国内北京、上海、香港、台湾及海外欧、美、日，甚至大洋州等地的重要博物馆及有关科研院所，几乎随处可见晋式铜器的身影，它们在器型和纹饰上大多能在侯马晋国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上得到印证。说到此，我们还应简单了解一下侯马铸铜遗址。

侯马是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所在地，作都城的时间为公元前585—前369年（春秋中期至战国前期）。新田遗址发现于建国初期，它包括城垣、宗庙、宫殿、祭祀、盟誓、墓地以及不同产业的手工作坊遗址，铸铜遗址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知面积近二十万平方米，是国内发现规模最大，遗存最丰富的青铜时代铸铜遗址。遗址内出土有铸铜陶范（即铸造模具）数万块，其中数千块上面有精美的花纹。从一些铸铜陶范的尺寸推知，当时这里曾铸过一人身高的巨

型编钟和一些不知名的大型铜器，文献曾记述晋国智伯为别国铸造过二马大车才驮得动的大钟，看来并非虚构，它们从生产规模，工艺技术和艺术风格诸方面都反映出当时晋国青铜工业和物质文化的卓越成就，并显示出晋国雄厚的经济文化实力。美国著名考古学家罗伯特·贝格立教授在考察了该遗址的规模、范围及现存于世的庞大晋式铜器群后，说侯马晋国铸铜作坊在当时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最大的铸造工厂，这话应当是可信的。

侯马作为晋都的时期也称作“新田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时期，同时又是晋国盛极而衰的时期，新田伊始，晋国继续看晋文公开创的霸业，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华夏盟主地位近一个世纪。新田后期，晋国国内政治逐渐分化，公卿之间，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最终以韩、赵、魏“三家分晋”而迫使“天下莫强焉”（《孟子·梁惠王下》）的晋国退出了历史舞台。人们熟知的“下宫之难”，也就是“赵氏孤儿”的故事（前583）、栾书弑君故事（前573）、水淹晋阳故事（前453）、三家分晋故事（前403）等，均是发生在新田时期晋国国内的著名事件。而与晋国有关的“国际事件”，则如晋秦麻遂之战（前578）、栢之战（前562）、晋楚鄢陵之战（前575）、湛阪之战（前557）、晋齐平阴之战（前555）、晋郑铁之战（前493），以及华元弭兵（前579）、向戌弭兵（前546）、澶渊之盟（前553）、黄池之会（前482）等。

同样正值新田时期，中国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革，所谓“礼崩乐坏”，“贱妨贵，少凌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便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写照。其实这是一次具有积极意义